心灵的创造

——论新历史小说中“为人生”的文学理想

刘玉芳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从客体对象看,新历史小说强调历史与当下的内在联系,是写与现实联系起来的过去,而不是消逝了的历史;从主体创作来看,新历史小说服从主体内心体验,忠实于作者灵魂的召唤,强调主体对客体的理解,是以历史为背景的主体心灵的创造;在新历史小说中,主体在追求自己的文学理想时,运用了独创的艺术手法。

[关键词] 新历史小说; 为人生; 主体; 客体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6-0092-03

历史从来就是个令人偏爱的话题,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逝去了的存在而被人津津乐道,而且还作为一种方法论被渗入到文化、社会学、文学史、美学等各个领域。人们总会用历史的眼光把事物和当下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历史也被当作辨别是非、沉淀真理、掌握规律等的见证人。历史小说,则也负载着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深刻解剖与批判。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由于新的文学观、史学观及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历史小说的叙述从真实的“史”中分裂了一种对“虚”的叙述。这种叙述抛弃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只是把描写的蓝图推移到历史的空间。特别是以“民国时期”为背景的大部分小说“避免了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主要“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陈思和还认为“新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利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1]这很大层面上概括了新历史小说的一个共性,却绝大部分否认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虽说新历史小说的大部分作家戏说的历史来源于民间,但这种民间的“本来面目”不仅仅就是过去历史中存在了的,它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存在及在“历史”的标榜下蕴涵着更深刻的意义。

一 从客体对象看,新历史小说强调历史与当下的内在联系,是与现实联系起来的过去,不是消逝了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后期,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发生转向,加上西方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喧哗躁动,新历史小说在开放繁杂的时代转变中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屹立在世人面前,让人对历史、对人生、对命运、对社会有了耳目一新的看法。新历史小说中所强调的历史,不仅是与当下的现实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而且小说中的历史有它存在的

抽象意义。主体通过对客体的审视,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新历史小说中所描写的“历史”,是小说中充满激情和蛊惑的大染缸,在这个染缸里,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思想、动作、行为交相辉映,有时甚至不外乎为人的存在扯上了神秘的联系。张炜《古船》中沉没的古船;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鹿;苏童《妻妾成群》中的深闺大院;莫言《红高粱》中血红的红高粱等等,都寄托了某种象征蕴意,让人在留意其中余味时不得不反思着中间包含的许多,从而想到这些神秘的意象也与眼前的世界有神貌相和的联系。

新历史小说中的人与物都置身于一个大背景中,地主、佃农、小妾、姨太太、妓女、土匪、强盗与个性化了的革命战士、平民百姓一起源源不断地走进了新历史小说。你无法在历史教材内找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无法考证的人物,是虚构的人物,但是你能肯定他们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新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背景总有一个大致的时间段,在这个巨大的环境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事实。小说《大捷》中老百姓被逼与日军火拼;《故乡天下黄花》中农村几代人为争夺“村长”宝座而展开你死我活的争斗;《妻妾成群》中女人们的争风吃醋和勾心斗角等等。这些在历史潮流中发生的所谓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或行径是排斥在官方的历史潮流外的,它们以野史或流传而存在,而这些似是而非的存在在新历史小说中显得惊心动魄。这种种令人胆颤心寒的存在不仅仅在小说中得以存在而且可以蔓延到当时的历史,蔓延到现在的历史。观“史”可以知今——观正史可以把握历史的潮流,察新历史小说中的“史”便可以知晓今世那些不被人轰轰烈烈发现,但一旦发现又会在人心产生悲恸或震动的事实。

[收稿日期] 2008-11-11

[作者简介] 刘玉芳(1976-),女,湖南双峰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现代社会的利益是要求法律和秩序,而不是破坏这些历史传承的文明。而在新历史小说中出现的革命、暴力、权力、食、色是在任何权力、道德、礼仪的威胁、恐吓都不能阻止的,而是或严肃,或诙谐,或荒唐,又或合情合理,在沉重的历史背景下包含苦难,显得顽强无比,时而又神秘不可告人。在超出正统文化外产生的这些事实在现代法律之外时见发生。作家在抚摸沉重的历史时,痛苦地承受了历史的存在,从而也让人感受到现实的沉重,他们恪守历史的承载,追逐着严肃的理想,这种理想不仅离他们很遥远,而且离整个时代,离整个现实世界也很遥远。刘孝存在《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中认为作家在小说中所追求的理想有三:一是再现;二是记忆;三是梦想。这三种理想可概括为:就是创造一个文学的虚构世界,表现、表达或追求属于人类的共同理想。^[2]新历史小说其实也是虚构了一个历史的范围,再现了当时的社会情节,其实际便是引人去回顾与反思现代历史中的悲剧,让我们从历史悲剧的迷惘中走出来。也正是这种迷惘促使作家们不断苦苦寻找,寻找那历史迷宫中也许并不存在的出口。^[3]这尽管有一定的难度,但作家们仍然在追逐着。

张颐武在《盘点:2001年中国的10部小说》评点莫言新历史小说《檀香刑》时说:莫言将焦点集中在一个世纪之前的那个世纪之交,他一如既往地关切暴力,他仍然有惊人的对于酷刑的想象力,这部小说对于酷刑的异常细致的描写始终将读者置身于一种惊悚之中。这部小说似乎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另外一个起点的格外戏剧化的描述。莫言把一份民间故事式的粗犷和放肆留给了中国“现代”的起点,这里混合了欲望、恐怖和混乱。他的追问的焦点仍然是“现代性”与中国。莫言重新审视了“高密东北乡”初次与现代相遇的奇观。一个农耕社会的那些来自传说和神话的那些想象力一旦和“现代”相遇,一切变得格外不可思议。在“全球化”取代“现代化”变成中国的中心观念的今天,莫言回到“现代”的源头,审视它“发生”的那一时刻的种种不可思议之处,这让我们对于“现代性”有了另一份关照。我们不得不从莫言那些希奇古怪的事情开始重新思考,他提示我们从现代历史的悲情中走出来的可能。这让人不得不想:在“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希奇古怪”的事在今天“全球化”的社会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它们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这种不可思议的存在在“全球化”的今天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悲剧呢?新历史小说中的各种不合常规的行径,如:《檀香刑》中的极刑,《红高粱》中的血腥场面,《妻妾成群》中的杀人场面和杀人后的狂叫与疯癫,这种种行径——由个人暴力来执行“法律正义”,杀死官吏、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等等,在“现代”社会是反社会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是反社会的。

这样看来,新历史小说中所描写的“历史”似乎就是眼睁睁的现实存在,而新历史小说所表述的这种“历史”更为神奇与鬼魅。它从具体的历史中超脱出来,表现为一种更为抽象的历史意识,这其中的历史只是一个泛化的概念,但却为小说提供了很好的布局设置。所以,与其说是写历史,还不如说是“戏说历史”,这种抽象的历史意识是对传统文化

的回顾与审视,是对现代“人生”的眷顾与反思。

二 从主体心灵来看,新历史小说从主体内心并忠实于主体内心的召唤,以历史为背景强调主体心灵的创造

新历史小说虽说是历史的一种颠覆,而在这种巨大的张力中却追求一种人文信仰。新历史小说的作者已不再将强调救国救民,重塑历史精神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们在“一切历史皆当代史”的鼓舞下,大胆描绘心中的历史。他们追求广阔社会中那些形形色色的事实在历史中的投影。这种当下与历史辉映作用于主体心灵,让他们的思想与灵感源源不断的涌出。他们借助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某些理论,运用各自的叙述方式,在随意、无奈、弓张剑拔或者颓唐的内心召唤下,将历史由过去庄重严肃的阶级或阶级斗争层面转为对人生、对生存、对生命、对人性的发掘。

如苏童《我的帝王生涯》、陈忠实《白鹿原》、刘恒《狗日的粮食》、莫言《红高粱》,他们卸下史料的重负,塑造内心神妙的历史境界,追求心灵的自由,追求理想的人性美,追求适合现代人生存在的价值观。在正义与非正义,生与死、贫穷与富有、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等等上有其与众不同的评判。如苏童《米》中的主人公王龙对女人和米的强烈占有欲的夸张性描写,实际上便是作者在现实生存中那种为生存而竞争的张力在主体心灵爆发出来的对抗。将人和历史复原到对基本事物描写,实际上是把对现实社会中邪恶的不满装载在历史的方舟上,让它去承载他满腹的牢骚,去承载他对美好的向往,对真善美的追求。

正如法国作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描写的那样:“时尚欢迎这些舟船的故事:这些船载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社会的典范,开始伟大的象征性的航行”,“那些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疯人乘客是去寻找自己的理性。”^[4]疯人借着“愚人船”经过海域的净化去追求理想的上帝,去寻找自己的理性,拯救自己的灵魂。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也像“愚人船”里的朝圣者因为现代文明的难以适从,传统的现实主义方式无法承载历史的悲哀,他们在对传统与现实失落中的追念使他们不得不去寻找一艘通往理性的船。“历史”像广阔的天空接纳了这群渴望自由的追逐者。他们被都市中的飘零感与迷失感追赶着,他们希望能从现代文明中找到自己灵魂的归宿,于是他们便希望从田园、从家族、从历史、从人的最原始最本性中找回一些失落的东西,寻找人性的纯真,寻找生命的真谛,寻找自然的宁静。“《白鹿原》便做出了自己的明确解答,提出了另一种,也是代表性的价值目标。在这里,‘认识自我’的内涵,便是对‘民族秘史’——民族传统文化这座‘水下冰山’的透视;‘认识自我’的价值趋向和归宿,便是一种由民族传统文化精髓所孕育、所凝结的文化人格。”^[5]在《白鹿原》中的白鹿精魂便是这座“水下冰山”与“文化人格”的象征,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美好人格的化身,将作者的文学理想集于一身,在它身上我们看到现实中所失去的纯真与美好。在莫言的《红高粱》中,蕴涵在“我爷爷”“我奶奶”身上的原欲是何等粗砺蓬勃与顽强狂放,与现实世界迷惘、无精神寄托、无目标、无价值取向的被生活被生存所压抑下的扭曲了的情绪产生鲜明的对比,作者对现实情绪

的不满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

三 主体在追求自己的文学理想时,运用了独创的艺术手法

旧的价值不可挽回地倒塌后,精神的顿然迷失使人的精神情绪难免被动起伏,我们在作品中随处可看到主体情绪的大胆切入。各种非主流、非理性、非功利的价值观,有关人类的爱欲是历史文明“动力”的认知观,对种族记忆、集体无意识,对民族心理结构有影响的文化观等等在新历史小说中大行其道,并产生深刻的辐射作用。这种种观点与主义及与现实生活在主体心灵的投影,让主体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感情,他们往往采用自己独创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彰显内在的张力。迟子建《伪满洲国》不注重情节的完整性,而其心理描写看似边角废料在作品中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作者又借鉴了屠格涅夫、川端康成的小说风格,形成自己散淡随意之风,这样小说叙事节奏比较舒缓,形成散文化倾向,往往产生耐人寻味的韵致。

小说是一种叙事的艺术,新历史小说中的叙事在主体情绪统罩下,被赋予特殊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与作品中某种自由因素结合使新历史小说往往有一种神气瑰丽的美感。莫言的《红高粱》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写法,借鉴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运用大量想象、夸张、比喻、通感等修辞方法,让整个小说产生一种感性的魅力,炫目而耀眼。张炜的小说虽然在人物塑造上未曾有莫言、陈忠实的那样有张力,然而他在其小说中,不断地对苦难的反思,对人类罪恶的诘问,对历史中的被淘汰者的同情无不让人们被这种情绪感染而对拯救苦难现实社会,救赎人类灵魂问题给予思考。他主要在一

情绪感染中让人处于思考的艺术空间,在这空间体验生命的氛围,体验苦难的情怀。

新历史小说描写的历史并不是英雄的历史,而是将它还原于一个个事件,还原到油米柴盐婚丧嫁娶,即使有特定的民族仇恨,也被隐藏在生活中。作家们把写悲痛和屈辱用看似平淡的日常途径作为切入点,将整个时代悲剧融入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之中,在反思与追求中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这种文学理想的追求是内在与外在的统一,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是客体世界与主体人生的写照。无论它有多么先锋,多么前卫,多么颠覆历史,否定历史,然而在这种从历史中发掘“人生”完美,追求理想世界是新历史小说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参考文献]

- [1]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 [2] 刘孝存. 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J].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02, (6).
- [3] 潘 延. 心灵深处的迷惘[J]. 常熟高专学报, 2002, (5).
- [4] 米歇尔·福柯. 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5] 吴培显. 诗、史、思的融合与失衡——当代文学的一种反思[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Spirit Creation

—on the literature idea of “for life” in new historic novels

LIU Yu - f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Look from the object, new historic novels emphasize the inward rel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describe the past connecting with nowadays, but not the vanished history. Look from the subject, new historic novels obey to the subject's experience, loyal to the writers' soul, emphasize the subject's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object and they are created by the subject's hear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history. Secondly, while pursuing their own literal dream, subjects use creative skills.

Key words: new - historic novels; for life; object; subject

(上接第 84 页)

The Lively Forms of Adjectives in Shadong Dialect

SUNG Ye - ling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forms and features of seven kinds of adjectives in Shadong dialect: “AA + 后缀”、“ABB + 后缀”、“ACCB”、“ABAB”、“A 里 AB”、“AABB”、“AB 巴 B”、“AB 哩”。

Key words: Shadong dialect; descriptive form; adjective